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

邱文山 张玉书 张杰 于孔宝 著

齐文化
与
先秦地域文化



齐鲁书社

前 言

中国传统文化以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著称。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萌芽时期，而先秦时期的地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多元一体”特征形成的基础。先秦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处于发展进步之中，她是通过各种学派的相互砥砺、相互渗透而发展的，也是通过各地域文化的相互交汇、融合而进步的。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先秦各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其独立性，又有相互融合性。周初大分封，各诸侯国的纷纷建立，成为地域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西周以降，随着各诸侯国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集团，文化发展的地域性特征逐渐加强。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为代表的各诸侯国，因各自的地理环境、人文因素、政治格局、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使先秦地域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而齐文化是其中的一支奇葩。降至秦汉，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以先秦地域文化为基础，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整合。这一时期，各地域文化的整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立足于齐文化，并通过齐文化与先秦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与整合的研究，来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揭示文化发展的“互渗——统一”规律，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是本书的思想重心。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热

潮，对先秦地域文化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以先秦著名诸侯国所辖地区为中心的先秦地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学术成果大量涌现。如以山东淄博为中心的齐文化研究、以山东曲阜为中心的鲁文化研究、以陕西为中心的秦文化研究、以两湖为中心的楚文化研究、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三晋文化研究、以京津为中心的燕文化研究、以江浙为中心的吴越文化研究等等，可谓异彩纷呈。在研究成果方面，有如《齐文化丛书》、《楚学文库》等大型系列著作集成。这些都为本课题提供了丰厚而翔实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本书试从“先秦地域文化的文化生态及其总体特征”、“齐文化与鲁文化”、“齐文化与楚文化”、“齐文化与燕文化”、“齐文化与晋文化”、“齐文化与吴越文化”、“齐文化与秦文化”、“先秦地域文化的融汇与整合”等问题为切入点，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对先秦地域文化从总体上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研究。

《齐文化与先秦地域文化》为山东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课题组在山东理工大学科研管理部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于2003年写出初稿。又经过较广泛地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反复修改，最后定稿。作者具体分工如下：邱文山同志负责第一、六、八章的撰写和全书的统稿、定稿工作；张玉书同志负责第二章的撰写和全书的统稿工作；张杰同志负责第三章第二节第四、五、七章的撰写工作；于孔宝同志负责第三章的撰写工作。在撰写过程中，由于作者水平所限，难免存在问题甚至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齐文化与先秦地域文化》课题组

2003年6月

目 录

上 册

| | |
|--|------|
| 前言 | (1) |
| 第一章 先秦地域文化的文化生态及其总体特征 | (1) |
| 第一节 先秦地域文化及其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 (1) |
| 一、地域文化的概念及其分类 | (1) |
| 二、先秦地域文化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 (4) |
| 第二节 先秦地域文化根植的经济土壤 | (7) |
| 一、农耕文明是先秦地域文化诞生的主要经济土壤 | (8) |
| 二、手工业和商业是先秦地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 又一有力的经济支撑 | (9) |
| 第三节 先秦地域文化依托的社会结构 | (21) |
| 一、诸侯国林立是先秦地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原因 | (22) |
| 二、民族关系是影响先秦地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 重要因素 | (26) |
| 第四节 齐文化与先秦地域文化的研究对象、原则、 方法、目的和意义 | (29) |
| 一、齐文化与先秦地域文化的研究对象 | (29) |
| 二、研究齐文化与先秦地域文化的原则和方法 | (32) |
| 三、研究齐文化与先秦地域文化的目的和意义 | (35) |

| | |
|----------------------------------|-------|
| 第二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 | (38) |
| 第一节 齐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特征 | (38) |
| 一、齐文化的渊源 | (38) |
| 二、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 (44) |
| 三、齐文化的高潮 | (105) |
| 四、齐文化的流风 | (131) |
| 五、齐文化的基本特征 | (133) |
| 第二节 鲁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特征 | (135) |
| 一、鲁文化的渊源 | (135) |
| 二、鲁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 (153) |
| 三、鲁文化的基本特征 | (176) |
| 第三节 齐文化、鲁文化之比较 | (197) |
| 一、齐、鲁文化的渊源之比较 | (197) |
| 二、齐、鲁文化产生的自然地理环境之比较 | (215) |
| 三、齐、鲁经济之比较 | (220) |
| 四、齐、鲁风俗之比较 | (231) |
| 五、齐、鲁都城之比较 | (249) |
| 六、齐、鲁文化特征之比较 | (254) |
| 第四节 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 (262) |
| 一、春秋时期的齐文化与鲁文化的交流 | (263) |
| 二、战国时期的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交流 | (280) |
| 三、齐文化与鲁文化的融合 | (296) |
| 第三章 齐文化与楚文化 | (321) |
| 第一节 楚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特征 | (321) |
| 一、楚文化的渊源 | (322) |
| 二、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 (329) |
| 三、楚文化的基本特征 | (348) |
| 第二节 齐文化与楚文化之比较 | (351) |
| 一、齐、楚的文化渊源与自然地理环境之比较 | (352) |

| | |
|----------------------------|-------|
| 二、齐、楚政治之比较 | (360) |
| 三、齐、楚经济发展之比较 | (370) |
| 四、齐、楚习俗之比较 | (372) |
| 五、齐都与楚都之比较 | (376) |
| 六、齐、楚文化特征之比较 | (382) |
| 第三节 齐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 (386) |
| 一、先秦时期的齐、楚关系 | (386) |
| 二、齐文化和楚文化的交流 | (394) |
| 三、齐文化和楚文化的融合 | (399) |
| 第四章 齐文化与燕文化 | (418) |
| 第一节 燕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特征 | (418) |
| 一、燕文化的渊源 | (418) |
| 二、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 (423) |
| 三、燕文化的高潮——昭王振兴 | (436) |
| 四、燕文化的衰亡 | (442) |
| 五、燕文化的基本特征 | (445) |
| 第二节 齐文化与燕文化之比较 | (451) |
| 一、齐、燕的文化渊源与自然地理环境之比较 | (451) |
| 二、齐、燕经济发展之比较 | (457) |
| 三、齐、燕习俗之比较 | (458) |
| 四、齐、燕文化特征之比较 | (462) |
| 第三节 齐文化和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 (468) |
| 一、齐文化和燕文化的交流 | (468) |
| 二、齐文化和燕文化的融合 | (472) |

下 册

| | |
|---------------------------|-------|
| 第五章 齐文化与晋文化 | (479) |
| 第一节 晋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特征 | (479) |

| | |
|-----------------------------------|-------|
| 一、晋文化的渊源····· | (480) |
| 二、晋文化的形成····· | (489) |
| 三、晋文化的发展····· | (493) |
| 四、晋文化的基本特征····· | (518) |
| 第二节 齐文化与晋文化之比较 ····· | (524) |
| 一、齐、晋的文化渊源与自然地理环境之比较····· | (524) |
| 二、齐、晋政治发展之比较····· | (532) |
| 三、齐、晋经济发展之比较····· | (542) |
| 四、齐、晋军事发展之比较····· | (548) |
| 五、齐、晋习俗之比较····· | (552) |
| 六、齐、晋文化特征之比较····· | (558) |
| 第三节 齐文化和晋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 | (563) |
| 一、先秦时期的齐晋关系····· | (563) |
| 二、齐文化和晋文化的交流····· | (574) |
| 三、齐文化与晋文化的融合····· | (588) |
| 第六章 齐文化与吴越文化 ····· | (604) |
| 第一节 吴越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特征 ····· | (604) |
| 一、吴越文化的渊源····· | (604) |
| 二、吴越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 (618) |
| 三、吴、越文化的融合与吴越文化的基本特征····· | (627) |
| 第二节 齐文化与吴越文化之比较 ····· | (638) |
| 一、齐与吴越的文化渊源与自然地理环境之比较····· | (638) |
| 二、齐与吴越的经济发展之比较····· | (647) |
| 三、齐与吴越的军事之比较····· | (653) |
| 四、齐与吴越的语言、习俗之比较····· | (662) |
| 五、齐都城与吴、越都城之比较····· | (676) |
| 第三节 齐文化和吴越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 | (683) |
| 一、先秦时期齐与吴、越的关系····· | (683) |
| 二、齐文化和吴越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 (687) |

| | |
|-------------------------------------|--------------|
| 三、孙武对齐与吴越文化交融的贡献····· | (690) |
| 第七章 齐文化与秦文化····· | (703) |
| 第一节 秦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特征····· | (703) |
| 一、秦文化的渊源····· | (703) |
| 二、秦文化的形成····· | (711) |
| 三、秦文化的发展····· | (715) |
| 四、秦文化的高潮····· | (724) |
| 五、秦文化的基本特征····· | (742) |
| 第二节 齐文化与秦文化之比较····· | (749) |
| 一、齐、秦的文化渊源与自然地理环境之比较····· | (750) |
| 二、齐、秦文化的形成背景及方式之比较····· | (760) |
| 三、齐、秦政治制度之比较····· | (762) |
| 四、齐、秦经济思想之比较····· | (770) |
| 五、齐、秦军事思想之比较····· | (776) |
| 六、齐、秦的习俗之比较····· | (782) |
| 七、齐、秦文化特征之比较····· | (791) |
| 第三节 齐文化和秦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 (805) |
| 一、先秦时期的齐秦关系····· | (805) |
| 二、齐文化和秦文化的交流····· | (818) |
| 三、齐文化和秦文化的融合····· | (827) |
| 第八章 先秦地域文化的融汇与整合····· | (839) |
| 第一节 先秦地域文化的融汇与整合的趋势····· | (841) |
| 一、“大一统”学说是先秦地域文化融汇与整合 的理论先导····· | (841) |
| 二、稷下学宫拉开了先秦地域文化融汇与整合的序幕····· | (851) |
| 第二节 先秦地域文化的融汇与整合的基础····· | (882) |
| 一、先秦地域文化融汇与整合的政治基础····· | (882) |
| 二、先秦地域文化融汇与整合的经济基础····· | (892) |
| 三、先秦地域文化融汇与整合的社会基础····· | (896) |

| | |
|--------------------------------------|-------|
| 四、先秦地域文化融汇与整合的文化基础 | (904) |
| 第三节 先秦地域文化的整合及齐文化在其 中的地位与影响 | (909) |
| 一、先秦地域文化的整合过程 | (909) |
| 二、先秦地域文化整合的意义 | (918) |
| 三、齐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阶段性整合中的地位及影响 | (923) |

第一章 先秦地域文化的文化生态及其总体特征

第一节 先秦地域文化及其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一、地域文化的概念及其分类

关于“文化”的概念，据不完全统计，有 160 种不同的定义。虽然定义有所不同，但可以宽泛地理解为：“与人的活动相关的一切存在。”《辞海》对文化的界定是：“从广义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达五千年之久。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力。世界上曾经有过与中国古代文化相媲美的文化类型，如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等，它们对于人类文明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些古老的文明，由于种种原因，有的消失了，有的衰败了，有的中断了。惟独中华文化传承不绝。这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气势恢弘、蕴

涵深刻、形式多样的文化，历来为古今中外学者所关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中国传统文化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新的亮点。以地域文化研究为切入点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方兴未艾。

地域文化，或称区域文化，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人文学科，它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文化探讨，其地域概念通常是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它在产生之初当然是精确的，但由于漫长的社会历史的演变，其地理学的意义逐渐模糊，其疆界更变，人丁迁移，景物易貌，只剩下大致的所在区域了。岁月的流逝虽然改变了古代区域的精确性，但这种模糊的“地域”观念已经转化为对文化界分的标志，深深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我国文化区域的产生大约起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①新石器时代初露端倪：燕山、阴山，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三个地区的文化开始形成自己的特点，经夏、商两代的发展，到西周的封邦建国，区域文化逐渐成熟。“只有当某一区域达到成就上的一致性，出现在此地域上的文化丛和文化结构时，真正的区域文化才算形成。”^②周代的各个封国以政治和经济的运作使区域文化由“自然”状态向有目的的主动创造发展，并确立了自己在该文化区域的中心地位。这些邦国在适应、改造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物质的、制度的、习俗思想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高度的成熟，文化的时空结构趋于稳定，为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秦统一天下，采取了一系列文化统一措施，致使一些地域文化的某些方面上升到国家总体文化的高度，而另一些地域文化的某些方面则归于消失。但是风俗习惯与思想价值等

深层次文化却能在物质与制度等文化消失后顽强地附着于其赖以产生的地域之上而传之久远。

客观地讲，影响地域文化形成的因素很多，但这些因素可以大体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的因素，一方面是社会的因素。自然的因素即自然环境，包括区域、地形地貌、水土气候等方面；社会的因素包括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等方面。

从自然环境方面看，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复杂，大体可划分为三个自然区，横跨六个温度带，地理属性的差异是明显的。古人已发现：不同地区的民俗传统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通过各自的行为系统表现出来。《诗经·国风》将当时的诗歌以“地域”分类汇集，生动的表现出各个文化区域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是将文化按地域类分的先声。《汉书·地理志》则明确提出了“域分”的概念，“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这里将人的行为和观念归因于两方面：水土的构成和君王的引导。其见解切实、精到。

从社会发展方面看，中华文明史跨越了几千年的沧桑岁月。对于“中华”一词，近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诠释道：“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③从章太炎对于“中华”一词诠释中，我们可以窥见历史变迁对地域文化的影响之一斑。

黄宾虹先生曾指出：“古今沿革，有时代性；山川浑厚，有

民族性。”（《九十杂述》）阐明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在中国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深远影响。

对于中国地域文化的分类，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在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出现了几种标准不同的划分。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种情形：一是以自然环境为主要特征，如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关东文化、西域文化等等，这些文化的划分主要是以自然区域为基本依据。二是以社会结构为主要特征，如滨海文化、内陆文化、草原文化等等，这些文化的划分主要是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为基本依据。三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兼重，如齐文化、鲁文化、楚文化、燕文化、晋文化、秦文化等等。一方面这些文化的划分是以周初诸侯大分封的自然区域为基本依据；另一方面这些文化又是在各诸侯国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形成、发展的，深深地打上了社会历史变化发展的烙印。

二、先秦地域文化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本书所关注的先秦地域文化，主要是指在周朝诸侯大分封之后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地域文化，如齐文化、鲁文化、楚文化、燕文化、晋文化、秦文化和吴越文化等。这些地域文化的自然区域是以周分封之初的疆界为中心范围，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版图为大体界限；其文化发展轨迹是在各地区的土著文化基础上，在周文化大力影响下，通过不断融合其他文化的因子而形成和发展的。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文化创造的自然基础。地理环境包括宇宙的、气象的、地质的、水文的、生物的等等诸多成分。这些成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

同构成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石、创造文化的自然前提，绝不是文化的消极衬托物。自从人的因素渗入到地理环境之后，地理环境已成为文化机体的构造成分，成为锻冶文化合金的重要因素。

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这种影响就更加明显。人类的活动必须以一定的地域环境为依托，不同的自然环境，使生活于该环境的人类必须选择相应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差异，又使人类所创造的文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我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的差异非常大，正是基于此，孕育了绚丽多彩的中华地域文化，先秦地域文化便是其中的一朵奇葩。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话有相当的道理。此说道出了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这片七八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在古代曾是林茂草肥、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域，华夏先民在这里狩猎、放牧，进而发展农耕地，奠定了文明的根基。夏、商、周三代都在黄河中下游建都立国，直到元、明、清，黄河中下游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区域。黄河中下游的确是我国古代先民的生息之地，然而中华文化的策源地又绝不限于黄河流域。根据考古发现，在淮河、长江、珠江，乃至辽河、云南等地，都发现有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表明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一百多万年至几十万年前，已栖息于东亚大陆的广大区间。这些区域的总面积，当在五百万平方公里左右。中华文化的繁衍地不仅区域广大，而且其地形、地貌的繁复，江河纵横，气候的丰富多样，亦为诸古文化区所罕见。

从地势、地形、地貌方面看：我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

东，形成了“三大阶梯”。第一阶梯为青藏高原，海拔四千多米，被誉为“世界屋脊”。第二阶梯为青藏高原以东以北，至大兴安岭、太行山、伏牛山、雪峰山一线；其内部地形复杂，既有阿拉善高原、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又有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吐鲁番盆地、四川盆地，还有塔克拉玛干等大沙漠。再往东为第三阶梯，包括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所占面积，山地、高原、丘陵约占三分之二，平原约占三分之一。山脉多东西走向，河流因而也多东西走向。

从气候方面看：中国大部属于温带，亚热带区域也不小，最南边伸入热带，最北部伸入亚寒带。完备的气候带使农作物多种多样，秦岭淮河以北成为以小麦、粟米为主要作物的旱地农业区，秦岭淮河以南成为以稻米为主要作物的水田农业区。东部湿润多雨，西部则寒冷少雨，成为东部为农耕区，西部为畜牧区的自然基础。

先秦时期，从地势、地形方面看，与今天当无多大差别。从气候方面看，虽有差异，但亦不大，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曾指出：中原一带，自仰韶文化至西周初年，气候温暖、动植物繁盛；此时期的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 2°C 左右，一月份的温度大约比现在高 $3-5^{\circ}\text{C}$ 。^④因此，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雨量充沛，森林草丛随处可见，如竹鼠、犀牛、大象等热带、亚热带的动物可以在此地区繁衍生息。西周、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一带还有梅、竹等亚热带植物生存。《诗经·魏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大约在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气温开始显著下降，热带、亚热带动植物逐渐绝迹，自然

环境逐渐变得类似于今天的情况了。

明人冯应京在《月令广义·方輿高下寒热界》中说：“中华地三分：一自汉蜀江南至海，二自汉江至平遥县，三自平遥北至蕃界、北海也。南方大热，北方大寒，中央兼寒热。东西高下亦三别：一自汧源县西至沙洲，二自开封县西至汧源，三自开封县东至沧海。东方大温，西方大凉，寒热不同，阴阳多少不一。”先秦地域文化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地理形势和多样的气候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

先秦地域文化因环境的差异而呈现出多样性，到晚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已大体形成。东临大海、山海兼备的齐文化大相歧异于处于“四塞之地”的秦文化；地居中原的三晋文化不同于南方的楚文化；同在长江流域而分处上游、中游、下游的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又各有特色。这些文化的形成当然更直接受到人文因素的影响，不过，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毕竟是文化多样发展的基础之一。

第二节 先秦地域文化根植的经济土壤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人类的活动始终受到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与自然的这种双向同构关系系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之中。在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经济活动是最重要的，是一切活动的基础。所以，当我们将对中华文化的生态环境和生成机制进行考察时，不仅要综览其自然条件、地理背景，尤其要探究依托于这种自然条件和地理背景之上所形成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古代，

依托于复杂的地理形势和多样的气候条件下形成的丰富多彩而又自成体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成为先秦地域文化根植的经济土壤。

一、农耕文明是先秦地域文化诞生的主要经济土壤

农业是利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过程获得物质资料的生产门类，是古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活动。而植物的新陈代谢要求特定的土壤、日照、水分和温度，因此，农业对气候条件具有高度依赖性，这种依赖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尤其明显。先秦地域文化的诞生地，气候以温带、暖温带为主，其绝大多数地区就日照和热能供应而言，都适宜农业的发展。先秦地域文化的诞生地的中心区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温和雨量适中，是动植物繁茂的区域。这一区域的人们，从六七千年前的彩陶文化时期，就逐渐超越狩猎和采集经济阶段，先后进入了以种植业为基本生产方式的农耕时代。这大体与世界其他主要古文明同步。考古发现证明：在这一历史时期，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和东亚的黄河——长江流域先后出现农业集约区植物的培植，动物的驯养获得了显著的成就，人口迅速增长。据统计，在八千年前至四千年前，地球人口增长了十六倍，这显然是农业提供可靠的食物源泉和定居生活所致。农业生产的发展成为古代文明进步的最有力的支撑。圣雄甘地在《印度文化十八篇》中曾指出：印度文化有三要素：一，耕田的犁；二，手工的纺织机；三，印度的哲学。其中前两个要素也完全适用于中华文化。

在距今六至四千年前，先秦地域文化的诞生地的中心区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先后完成了“新石器革命”。